

物的社会生命与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

张进,王珏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商品是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文化人类学领域开启了“物的社会生命”和“物的文化传记”研究,追踪物在社会文化中的“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轨迹。物在不断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价值,价值的不断转换也意味着物作为“行动者”对文化秩序和人的社会生活的介入,从而形成一种“价值的政治”。以阿尔君·阿帕杜莱和伊戈尔·科比特夫为代表的物的社会生命研究体现出物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及人与物的共生关系,为物质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物质文化;物的社会生命;物的文化传记;物价值的政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7)03-0042-07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3.005

张进,王珏.物的社会生命与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3):42-48.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and the Methodology of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ZHANG Jin, WANG Yao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Commodity is the key subject of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In the 1980s,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started discussing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and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and tracing the path of things in society and culture: “commoditization/de-commoditization/re-commoditization”. Different values of things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commoditization. Unceasing change of value means things as agencies a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orders and people’s social life, thereby developing the politics of value. Studies o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led by Arjun Appadurai and Igor Kopytoff, embody not merely the positivity and activity of things, but also a kind of symbiosis between people and things. What is more, they offer a new approach to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Key words: material culture;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the politics of things’ value

收稿日期:2017-02-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物性诗学导论”(15FZW02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世纪文论范式: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15LZUJBWYJ007)

作者简介:张进,男,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王珏,女,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理论研究。

阿尔君·阿帕杜莱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最具启发意义的编著之一,其中“物的社会生命”的论题开启了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融合并超越人类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商品分析的文化人类学的物品研究。由此我们定位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化人类学视角的商品研究。

“商品和人一样拥有社会生命”的提出基于阿帕杜莱对现代西方社会常识中人与物对立观念的质疑,他这样说:“建立在哲学、法律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历史传统之上的现代西方常识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将‘词’(words)与‘物’(things)对立起来。”^[14]这种观念下,物是惰性的,沉默的,只有通过人和人的语言它们才得以富有活力。阿帕杜莱认为传统人类学的问题在于“认为物除了人赋予它们的事务、属性、动力之外毫无意义,这种观念使其无法阐释具体的,历史的流通中的物”^[15]。理论上说人类行为赋予物以意义,而从方法论的角度则恰恰相反,动态的物阐释了人和社会的语境。阿帕杜莱认为事实上没有一种对物的社会分析(无论是经济学的,历史学的还是人类学的)能够避免“方法论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而正是这种“方法论的拜物教”修正了莫斯的那种过分用社会学方法对物进行分析的趋向,使我们重新将注意力转向物(它们自身)。如何理解“方法论的拜物教”呢?拿莫斯来说,他的《礼物》的目的是通过考察礼物这种特殊的物来说明人赋予物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交换。物承载的交换关系是一种总体的社会事实,没有这种交换关系,物品毫无意义,这就是物的社会性分析。而在方法论的层面,莫斯不可避免地分析大量的民族志中有关物品为何成为礼物,礼物如何参与交换关系的建立的案例。也就是说,阿帕杜莱认为不论哪种有关物的社会分析的理论,都必须通过跟随物本身,追踪物的轨迹来确立,在这个层面上,物解释了社会,并非人赋予物意义。

重新考察商品意味着视野和范畴的转变。对于商品的经典分析来自马克思,而在消费研究转向中,包括鲍德里亚在内的许多学者指出马克思的问题在于19世纪的特定语境限制其只能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谈论商品,并只重视历史性的商品生产。阿帕杜莱指出虽然马克思将有关商品的讨论限定在了当时他所处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状况中,但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析角度: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论是物物交换还是货币出现之后的商品交换都是以物为中心的社会关联。从交换价值的角度定义商品的价值是西美尔的观念,阿帕杜莱认为从“商品是任何可以交换的物”这个观念出发,可以避免过分强调生产和生产者意图的偏狭。可以看到从生产角度延伸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物化理论、文化工业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路径。

从交换的角度定义商品即倡导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将商品视为一种特定情境下的物,情境可以界定各种不同种类的物在它们的社会生命的不同节点的特性。这就意味着关注所有事物的商品潜质,而不是徒劳地寻找区分商品与其他种类的物之间的魔力。这也意味着聚焦商品从生产出发,通过交换/分配,再到消费各个环节的完整轨迹,突破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贯的以生产为主导的视角来审视商品的方法。”^[13]据此,阿帕杜莱分析了“商品情境”(commodity situation)的三个方面:1. 商品是任何物的社会生命的一个阶段;2. 商品是任何物的候选状态;3. 任何物可以被放置在商品语境中;也就是说,物品的可交换性使得物在社会关系网中不断流动,转变状态。我们首先引入伊戈尔·科比托夫的“物的文化传记”研究。

一、物的文化传记

“物的文化传记”的范畴中“传记”并非一种文体研究,而倾向于一种比喻,即像为物立传一样研究物在文化情境中的流动过程。英文 Biography(传记)的前缀 bio-意味着“有生命的”,在词典里该词的

意思是“记录某个人的经历的文体”。因此“物的文化传记”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物和人一样拥有社会生命。从阿帕杜莱那里我们看到商品情境中物要么是商品、要么处于商品的“候选”状态,因此在文化的视野中,科比托夫的“物的文化传记”研究的实质是考察物的商品化过程。为什么要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生产的研究视角而进入物的商品化过程的研究,科比托夫做出如此解释:“在文化的视野中,商品的生产也是文化的和认知的过程:商品一定既作为物质上被生产的物,也是文化上被标记的某种物。”^{[2]64}不同的文化情境中物的状态不同,例如同一物品在某一阶段是商品,某一阶段则可能不是;有人认为是商品的物在他人看来则可能不是,物的文化传记研究就是揭示物在文化中不断被标记,不断转换身份,呈现不同的“生命状态”的过程。

科比托夫介绍他的研究源于奴隶制下人的商品化过程的启发。对奴隶制的传统看法认为奴隶是财产(物),而这逐渐被一种过程性的观念所取代。在这种过程性的观念中,奴隶的社会身份的转变过程被揭示出来。如果给一个奴隶写一部传记,他(她)的被奴役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奴隶在被交易的时候是经济意义上的商品,而一旦进入被主人购买而到新的环境中,奴隶获得了新的身份。也就是说,奴隶经历了商品化到再社会化、再人化的过程。同时,再人化的奴隶也是潜在的商品,因为其随时可能再度商品化。这个过程对于其他物来说也适用,因此科比托夫的“物的文化传记”研究强调的第一点是:商品化并非“是或非”的判断,而应看作动态转换的过程。

科比托夫强调的第二点是:特殊性。商品的特殊性从两方面考察:文化的和个体的。商品化使价值同质化,相关论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著中比比皆是,而把商品化看作“生产的过程”就会发现在文化中商品的同质化和特殊化相互交织。“文化确保一些物品保持其明确的特殊性,来抵抗商品化;有时也会把已商品化的物品再特殊化”^{[2]73}。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商品化的对立面,必须确保某些物的特殊化来抵抗同质性的商品化。另一方面,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个体的角度同样至关重要。物在文化中建立的秩序可能在个体这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任何社会中,个体通常都身陷商品化的文化结构和他个人化的赋予物的世界与价值秩序的尝试之间”^{[2]76}。尽管文化和个体通常是矛盾的,对抗的,但正是文化和个体的共同作用才使物的世界丰富多样。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考察,科比托夫指出西方传统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亟需改变。传统的倾向是从概念上划分人和物,人是特殊化的(具有个体性和自主性),物是商品化的(被动的、同质化的),这种划分在启蒙后的西方现代性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当代大规模的商业化和货币化社会中,这种观念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虽然在譬如运动员转会、演员签约等交易从自愿和契约的角度规范,使其不被视为人的商品化,从法律和道德对儿童领养制度进行双重规范使其不被视为人口买卖等事务中,文化设立壁垒防止“人的领地”不被商品化,但是在科技不断革新的当代,这些壁垒效力很难继续发挥下去。尤其在人与物界限交叉的领域,如“冷冻卵子、精子”“器官移植”“代孕母亲”这样的现实议题中,商品化和特殊化的交织已成事实。

科比托夫指出在文化的视野考察物的传记需要历时性地从两种不同规模的社会入手。一是小规模的非商品化社会,二是大规模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

机械化复制设备的大规模使用是物品流通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商品得以大量复制,批量生产。物品从此从小规模的非商品化社会过渡到了大规模的商品化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物的大规模的商品化意味着物的交换行为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且交换并不意味着消费行为的结束,反而是消费过程的开始。技术飞速发展使得原本明确的交换领域变得复杂而多样。物的社会生活传记的考察从社会历史、技术等领域过渡到多维的文化领域,并把视角聚焦于消费文化。“现代社会中社会环境与个人的品味之间的关系较之小国寡民的、非货币的、前工业社会的时代之中要更为紧密些”^[3]。在现代化

的工业社会里,商品化与社会、政治、技术、传媒、消费者个人趣味、社会心理等等因素相互作用,物品呈现出“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复杂的过程性。物品进入了人的日常生活,被人赋予某类特殊意义、价值、身份的同时参与了人的身份的建构,他们通过消费某物进行自我表达和评估。走向特殊化的物又会经历再次商品化的过程,去商品化使再商品化成为可能,正如丹尼尔·米勒所说:“一旦货物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商品,而是看作现代文化的主要成分,消费的可能性就出现了。”^[4]去商品化过程是意义的再生产,并引发新的消费需求,因此“重新语境化”的物便会经历又一次商品化过程。

综上所述,在复杂的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进行“物的文化传记”的研究强调的是物(和人一样)的身份的不确定性,考察物的商品化和特殊化的动态转化和交织,物如何在文化和个体的双重秩序化中重组,又如何对社会文化和个体进行反作用。正如科比托夫在结论中所说的,物的文化传记表明了他对涂尔干的观点的修正。涂尔干认为,人的社会的普遍结构模式规定了物的秩序,而科比托夫则认为人和物在社会中是以同样的方式共同建构。因此,“物的文化传记”研究“使我们能够避免视对象为一系列既定形式中某一结构获得真实性的结果,同时保证我们关注物如何具体运动,如何在多种状态之间‘过渡’,以及作为具有时间性和节奏性的形态或连贯行为的物如何受到(自我)管理等问题”^[5]。

二、商品的路径与偏移

不论是马克思的商品分析还是涂尔干的圣物和一般物分析都展现了一种观念:商品是和其他种类的物区分开来的某一种类的物。阿帕杜莱和科比托夫等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者则指出商品是物的存在的特定阶段。受科比托夫“为物立传”的启发,我们认识到物作为商品,它的“生命历程”并不止于购买行为完成,很大程度上说,其“生命历程”从购买行为完成之时才刚刚开始。阿帕杜莱声称自己并不十分赞同科比托夫在《物的文化传记》中显露出来的对商品化和特殊化的区分与对立,因此他将科比托夫那里的商品化和特殊化发展为商品的路径(path)和偏移(diversion)。需要指出的是科比托夫并非将商品化和特殊化对立起来,相反他自始至终试图论证商品化和特殊化是互相转变和交织的,但是科比托夫的问题是为了便于论证而将商品化和特殊化区分讨论,举出的案例过多地倾向于特殊物品或暂时或永久性地商品化,这致使其无法避免地被误解。阿帕杜莱提出商品的路径和偏移是对该问题的缓解和延伸。

“路径”和“偏移”的概念源自南希·穆恩(Nancy Munn)分析噶瓦(Gawan)人的库拉^①系统的文章。南希指出,虽然在库拉系统中,物品的流通有其相对稳定的路径(这个路径既包括不同种类的贝壳从地理上的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之间的方向,也包括它们在相对稳定的群体之间的流通,即与人构成相对稳固的关系),但库拉是行动的系统,在行动的过程中发生着偏移。偏移意味着新路径的产生,新路径不断产生,不断从既定的路径中发生偏移,例如具体的贝壳在不同人看来价值不同,在交换时形成的关系也不同。事实上,库拉系统中的人必须有能力寻求一种平衡,他必须不断地通过交换贝壳来保持既定路径,但又不得不不断地面对偏移。因此在南希看来,库拉系统中物品交换的路径和偏移过

^①“库拉”(kula)是西太平洋一些岛屿氏族、部落的跨部落的交换体系。这些岛屿、地域形成一个地理上的圈,两种物在这个循环圈内相向交换流通,一种是红色贝壳连缀的项链,一种是白色贝壳加工成的臂镯。这两种物品在各自的轨道上流通,因此“库拉”系统通常被称为“库拉圈”。“库拉”体系包含了贸易、赠礼、仪式、宴请等众多社会活动。对库拉的经典分析来自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此之后“库拉”成为文化人类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程中人对物(贝壳)不断进行分类,赋予其价值,同时,物也不断对人进行界定。^①南希对库拉系统的路径和偏移的描述对理解阿帕杜莱的商品流通机制的分析有很大帮助。

在商品生产的角度,某种商品从生产到消费是一条既定的路径。不论是从具体的实用性还是从文化秩序的操控都规定了商品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它们面向的消费群体,在这种状况下,商品和消费者都被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所操控。这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在文化的视野中,从物的角度、消费的角度看,商品则经历着短期的和长期的过程。在阿帕杜莱看来,短期内的偏移策略可能引发在消费领域内的变化,从而逐渐改变商品长期的流通模式。现代社会最经典的偏移是商品变为展览品、收藏品或者成为某种时尚的一部分。这是商品的审美化,例如陶瓷盘子从餐具成为家庭摆件,军队制服成为大众时尚服装。从商品流通模式的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消费长期建立起来的模式受到既定的商品流通路径的限制。也就是说陶瓷盘子成为家庭摆件成为长期的需求,必定在再生产中形成既定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阿帕杜莱认为消费是社会性的、主动性的,而非个体性的、被动的。

社会性和主动性是看似难以调和的概念范畴。阿帕杜莱的观念是:消费既发送社会信息,也接受社会信息^[13]。也就是说,消费被经济的、社会的力量所操控和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消费在一定的社会性限制之内又反作用、反操控了经济的、社会的力量。

三、通向一种价值的政治

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在商品领域主要聚焦于商品的流通与消费研究,在复杂多元的文化中,研究者们愈来愈意识到从生产的角度理解和分析商品片面而不准确。“商品体现了复杂的社会形式和知识分布”^[14]。显然生产知识中的商品和消费知识中的商品大相径庭。因此将商品视为有社会生命的物和将商品化视为过程性的观念有利于多角度地对商品流通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而不是囿于传统的生产的角度视商品为静态的客体物。

带着这样的观点,阿帕杜莱所谓的“价值的政治”变得容易理解。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而是复杂的文化体系。商品的价值也并非在经济贸易和货币交换领域中体现,在文化体系中,商品的价值恰恰在其“生命历程”中得以彰显,可以说在远离生产者、交易者的情境中,商品的文化价值才愈发凸显。

从前两部分“物的文化传记”和“商品的路径和偏移”的考察和论证中我们已经看到突破生产角度之后的商品分析之可能的维度。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落脚于一种“价值的政治”,在于阿帕杜莱试图将探索的触角伸向商品流通过程中的社会能量的碰撞之地。“政治(广义上与权力有关的关系、假设、争夺)连接了商品的社会生命中的价值与交换”^[15]。在不断的交换流通和价值协商的过程中,特权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被反映出来,同时也被建构起来,而政治就形成于既有的路径与商品对这一路径的不断偏移之间的张力。带着这样的观点重新审视商品的收藏、特殊物的本真性、广告等商品研究领域的主题则会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结论,为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开辟新的维度。

物的收藏。进入收藏路径的物品拥有不进入一般商品路径的特权。普遍的观点是,它们如同涂尔干所说的圣物,被区分、隔离出来,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某个群体的意识。再如鲍德里亚的“符号-物”的观点,被收藏的物本质上是某个符号体系中的符号,它之所以被从一般功能物分离出来是因

^①参见 Nancy D Munn. *Gawan kula: spatiotemporal control and the symbolism of influence*, 收录于 Leach and J. Leach. *The Kula: new perspectives on massim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277-308.

为意识形态赋予其某种意义。而在物的社会生命历程的理论视域中,物品成为收藏只是它从既定商品路径上偏移为“准商品”。在当代复杂多元的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藏品进入估价机制,虽然有些藏品被广泛认为是无价的,但在拍卖、保险等相关范畴中,藏品被估值,成为“准商品”,它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交易物,但也可能在拍卖成功和被盗窃后重新进入交换流通路径。物的“准商品”和“商品”的身份交替突破了商品/非商品的二元偏见,在不同的情境中联结了不同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关系。

物品的本真性。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分析了与艺术作品的独创性紧密相关的本真性“光晕”在现代复制技术中失灵。我们看到在本雅明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对在技术变革中诞生的“文化工业”的强力批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注释中本雅明提到:“一幅中世纪的圣母玛利亚画像,在它被创造出来的那个时候,还不能算作是‘真品’,只是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它才成了‘真品’。”^[6]“真品”是个相对的概念,一件特殊物品,在偏移了既定一般商品领域后具有“圣物”的特质,在收藏者那里它体现了某种拜物价值,而在复制技术影响下的艺术世俗化之后,这种拜物价值很大程度上被本真性价值取代。本雅明的这个注释颇有启迪意义,但是本雅明只关注了技术作为核心的革新力量作用于物引发的转变,从物的生命历程的角度看,这些转变都具有文化的维度。在变革产生的地带凝聚了政治的张力,各种社会能量之间的抗衡和协商。物品成为具有本真性的特殊物的过程体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审美、品味、价值评估等方面的多样性。例如一件限量生产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后不断增值,成为纪念品、藏品,在生产者这里体现为商业化的策略,而在消费者这里并不仅仅意味着受这种商业策略的迷惑,更重要的是通过拥有这个物品来体现和构建自己的身份。再如,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通过不断复制,重复印刷、拓印、投影的方法进行“反本真性”创作,他将画作批量印刷生产,甚至签名都由其助手或母亲代签。从生产的角度,安迪·沃霍尔的画作并无“本真性”原作可言,而进入流通领域,受到文化情境、审美趋向、商业策略的影响,这些产品却成为紧俏的藏品、高价拍卖品。

广告。广告一直被认为运用诱惑机制来操控消费者,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这种极有说服力的分析过于将问题简单化。事实上,就广告作为物本身来说,它的图像、文案、设计与文学和审美有关,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体现了某一时期的生活方式。诱惑机制只是广告策略的一部分,整体上看,广告涵盖了社会文化的多个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不一定是策略实施方,不同的受众群和消费者需求都影响着广告策略的制定。广告本身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活动,同时它也汇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不断操控和抵抗的力量。

阿帕杜莱说:“政治联结了价值机制和商品的特殊流通。”^{[1]57}借用雅克·朗西埃对政治这个术语的核心解释——介入和对抗^[7],所谓物的“价值的政治”关涉的是文化秩序的建立和被突破对抗关系中物的介入。物在不断商品化(路径)和去商品化(偏移)的流通过程中拥有不同的价值,价值的转换也意味着物作为“行动者”对文化秩序和人的社会生活的介入。因此,“物的社会生命”中的物是社会性的、主动的。视物拥有社会生命即从商品化的过程性的角度探讨物品在不同的阶段的价值机制,从各种社会力量介入物的价值机制和物同时也不断介入人的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关系张力中形成一种商品的(或物的)政治。这样,物既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空间,也是文化体系中的行动者和实践者。

四、结 语

以阿帕杜莱和科比托夫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重新考察现代社会中长期以来被置于与人对立的位置的物(商品),主张物和人一样拥有社会生命,在文化视野中为物(商品)立传,是跨学科、多领域中“物的转向”思潮和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维度。在《物的社会生命》一书的其他章节

中,当代人类学家为我们呈现了物的视角的丰富的民族志研究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与传统的人类学聚焦于物是为了再现一定地域、族群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分析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同,“物的转向”中的“物的人类学”则既重视物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命运”流转,也重视物的生命历程对社会的影响,换句话说,“社会建构物”和“物构成社会”是双向互动,相互交织的。

众所周知,任何研究方法都与其所从属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关联,过于关注阿帕杜莱和科比托夫等人的具体的考察物的方法容易忽视对文化语境和基本立场的把握。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文化人类学领域转向“物的社会生命”的研究的动因。1973年,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指出:“对于文化分析而言,永远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在寻找深伏在底层的乌龟时,它会迷失表层的现实生活——使人们在方方面面受到制约的政治、经济和分层的现实——和这些表层的现实生活建立其上的生物和物质的必要因素……首先要使文化分析的目标对准这样的现实和这样的必要因素。”^[8]姑且不论后结构主义之后“表层”与“深层”的说法是否恰当,格尔茨指出的文化分析的危机可谓一针见血。阿帕杜莱也在《消散的现代性》中指出:“宏大的西方社会科学(奥古斯特·康德、卡尔·马克思、费迪南德·滕尼斯、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所留下的最成问题的遗产之一,是它不断地强化我们对某些特定时刻的感受——姑且称之为现代时刻——仿佛正是这些时刻的出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制造出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断裂。”^[9]在阿帕杜莱看来,当今世界现代性是散逸(at large)的,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在全球化视野下变得含混、模糊。“自涂尔干以及《社会学年鉴》团体的著作问世以来,人类学家们便学会了将集体表象视为社会事实——也就是说,认为它们超越个体意志,承载着社会道德的重量,是客观的社会现实”^[9]。然而,20世纪后期随着科技迅速发展,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人类学领域,在本尼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影响下,“想象已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事实。这一发展转而为想象世界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9]。这个转变带来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艺术、神话、仪式扩展到普通的日常社会生活。阿帕杜莱的观点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学无需再运用之前的“观察未开化的人”的方法,而需要尝试为文化研究做出贡献。文化人类学以其对日常生活体验的独特把握更广泛且跨学科地研究全球化进程,因此,当代文化人类学领域致力于从文化的差异性出发来发掘商品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探讨事物与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互构关系。

参考文献:

- [1] APPADURAI A.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M]// APPADURAI A.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 KOPYTOFF I.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M]// APPADURAI A.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 阿尔君·阿帕杜莱. 商品与价值的政治[M]// 物质文化读本. 孟悦, 罗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3-24.
- [4] 丹尼尔·米勒.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 费文明, 朱晓宁, 译.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0: 185.
- [5] 斯科特·拉什, 西莉亚·卢瑞. 全球文化工业: 物的媒介化[M]. 要新乐,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9.
- [6]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王才勇,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134.
- [7] 雅克·朗西埃. 文学的政治[M]. 张新木,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4.
- [8]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4.
- [9] 阿尔君·阿帕杜莱. 消散的现代性: 全球化的文化维度[M]. 刘冉,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责任编辑 杨文欢)